airiti Library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一部張文環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滾地郎》－眾生相、自在觀境界的極致

Zh ā ng Wénhuán's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Place" as Taiwanese's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ge; the Acme of the people and the Free Field

doi:10.29716/TKSFLL.200912.0002

淡江外語論叢, (14), 2009

Tamkang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4), 2009

作者/Author： 曾秋桂(Chiu-Kuei Tseng)

頁數/Page： 21-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716/TKSFLL.20091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airiti

一部張文環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滾地郎》

——眾生相、自在觀境界的極致——

曾秋桂 / Chiu-kuei Tseng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教授

Department of Japanese,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滾地郎》是張文環用日文在日本發表的最後一篇完整小說作品。作品時間自 1909 年至 1945 年止 35 年間。佔約整個日據時代的三分之二左右時期。作品主角啓敏與作者張文環關係密切。並且考量了《滾地郎》創作動機，與 1972 年台日斷交有關。故將《滾地郎》定位爲一部張文環的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以此爲基調，探究張文環個人的精神、寫作風格的成長。

【關鍵詞】

自傳性、張文環、《滾地郎》、眾生相、自在觀

【Abstract】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ground” was published in 1975, as the last Japanese completed novel work which published in Japan by Zhang Wenhuan. The work age is set during 35 years from 1909 to 1945. The born time and the place relation in the birthplace of Qimin who is a main character of this work between Zhang Wenhuan as the author are very similar. The creation motive of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ground” is related to break in Japan and Taiwan in 1972. Therefore,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ground” is like a Zhang Wenhuan's autobiography work.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ground” is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aiwanese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ge.

【Keywords】

autobiography, Zhang Wenhuan, “The person who crawls at the ground”, public people's appearance, freely contemplates.

airiti

1.歷史小說風潮下的張文環《滾地郎》

隨著台灣興起的後殖民地相關研究的熱潮，陸續不斷有優秀的研究成果發表。又加上 1987 年國民黨政府頒佈解嚴令之後，先前被視爲禁忌的「228 事件」[1]方可與常用的抗日題材「霧社事件」[2]等歷史事件並列，當作寫作題材撰寫成小說發表。其數量亦相當可觀[3]。

在此氛圍之下，張文環《滾地郎》雖沒有像上述一般，具體的事件明顯地融入作品當中，但卻別具獨特特色。因爲張文環《滾地郎》開宗明義的第一章中，即點出「昭和十三年」改姓名制度頒發的時間點、與具體空間「梅仔坑庄」的陳述，又極力循著歷史的軌跡，鋪陳山村「梅仔坑庄」的發展史。此類趨勢頗具有歷史小說風範的取向。鑑此，應可將張文環《滾地郎》，當作歷史小說來閱讀。

而張文環《滾地郎》在文壇上的評價，可見於 1978 年 9 月台灣文學研究大家葉石濤發表於《中國晚報》〈張文環文學特質〉一文。同年的 12 月發表的另一論述〈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一文中，葉石濤更明確地將張文環譽爲日據時代台灣作家中的翹楚[4]。至於〈張文環文學特質〉該文中，指出《滾地郎》爲「最清晰地透露出張文環先生的思想、生活態度以及堅強的民族精神」[5]。1975 年《滾地郎》在日本發刊後，立即獲選爲當年度「全日本優良圖書一百種」[6]。又根據柳

---

[1]1945年戰爭結束，台灣回歸祖國中國大陸。1947年國民黨軍隊來台接收時，與台灣民眾間發生紛爭而引發台灣大多數的知識份子被殺慘死的事件。融入該事件寫成的小說亦無以數計。例如有李昂《自傳の小說》(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姚嘉文《霧社人止関》(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邱家洪《台湾大風雲第三冊二二八驚魂》(前衛出版社，2006)等。

[2]日據時期1930年發生之台灣原住民的武裝抗日事件。以此事件寫成的小說不計其數。例如有林藜《瀛洲斬鯨録—台湾同胞武裝抗日的歷史故事—》(稲田出版有限公司，1992)、陳玉慧《海神家族》(INK印刻出版公司，2004)、閻延文《青史青山》(問津堂書局，2006)、津島祐子《あまりに野蛮な》(連載於雜誌《群像》，2006.9-2008.5) 、姚嘉文《霧社人止関》(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等。

[3]不只日本殖民地時期而已，將台灣300年間的歷史融入成小說題材的風氣不減。例如前衛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了趙世男、洪明燦合著《台湾老兵三国誌》、2006年出版了邱家洪著《台湾大風雲》(全五冊)、橘子出版有限公司於2003年出版大陸人士閻延文所著《台湾風雲》(上下二冊)。

[4]葉石濤，〈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葉石濤全集14》，(台灣：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頁117。本文第一次發表於1978年12月13日《民眾日報》。

[5]葉石濤，〈張文環文學的特質〉，《葉石濤全集14》，(台灣：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頁93至94。本文第一次發表於1978年9月4日《中國晚報》。

[6]同前揭葉石濤書，頁93

書琴指出：《滾地郎》在日本出刊的隔年 1976 年，作家廖清秀將之譯成中文，由鴻儒堂出版社出版，並於 1991 年再版。《滾地郎》一書爲至今日台間最爲知名的張文環代表作。而「泥土」一詞，乃是張文環最喜歡的詞彙，1943 年張文環曾經計劃以此爲標題，由東京的道統社出版短篇小說集，最後未能如願以償[7]。

2. 《滾地郎》當作自傳性小說的可讀性

《滾地郎》既非日記作品又未言明是自傳小說，何以能將之視爲歷史小說取向的自傳性小說，依此來探究張文環個人的心路歷程，甚至探索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呢？所持理由，有如下兩點。

第一點：《滾地郎》的男主角陳啓敏和作者張文環，乃是爲同時期的人物。男主角陳啓敏可視爲作者張文環的分身。

《滾地郎》作品中，時間的鋪陳多處相互矛盾，如此前後不一的敘述，造就了作品解讀的困難度，此乃《滾地郎》的一大問題特色。諸如：指的是陳啓敏進小學就讀時是 16 歲的同一件事情，卻有「大正十二年」〈第六章之三〉、「大正十年」〈第六章之三〉的兩個不同時間點的說法。

縱此，《滾地郎》第一章之一中明確點出作品的時間點「昭和十三年」。主角啓敏秀英夫婦也是在一年的春天結婚〈第六章之一〉，開始了他們人生的新里程碑。據常理判斷，人生重要的結婚大事的時間點，不該記述有誤。所以依此爲基準點，推算主角夫妻的年紀，應是合理。續之的第三章之三中，明確敘述了昭和 12 年時啓敏是 30 歲。再配合上其他作品中重要人物相差的歲數來推斷，可以推算出作品的主軸時間點昭和 13 年那一年，啓敏是 31 歲、秀英是 26 歲、女兒阿蘭是 8 歲。再更進一步依此推算，啓敏應爲 1908 年左右出生[8]的人物。眾所皆知，

[7]柳書琴著中島利郎譯，〈張文環『山茶花』解説——部落から都会へ、進退窮まった植民地の青年たち〉，中島利郎、川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2台湾長篇小説集二》(緑蔭書房，2002)頁384。

[8]其他作品時間互相矛盾得鋪陳，最重要莫過是陳啟敏的養父陳久旺與吳錦的結婚時點。因為作品最早可以追溯至此。例如：文本寫道陳啟敏的養父陳久旺與吳錦於「明治四十二年的農曆十二月中旬」〈第一章之三〉結婚。結婚整整過了一年後〈第一章之五〉，妻子吳錦發現丈夫久旺與酒家小姐有染〈第一章之六〉，端午節前吳錦拿出證據向久旺父親揭發，久旺父親聞之氣絕身亡〈第一章之六〉。久旺父親百日之後，陳家先領養個養子〈第二章之一〉，以便容易生到親骨肉。5歲啟敏於是在該年的中秋時分，被親生父親帶來到陳家當養子〈第二章之一〉。由於當吳錦想著結婚整整過了一年，肚子尚未爭氣懷孕，「後院的竹林下桃花盛開，和去年新婚時所看的桃花，感覺完全不同」的當時情景描述

張文環是 1909 年出生於嘉義縣梅山鄉〈舊稱梅仔坑〉。而與《滾地郎》的男主角啓敏的出生時間點與鄰近梅山鄉的出生地緣關係來看，《滾地郎》的男主角啓敏與作者張文環的生長背景，十分吻合。當然張文環是個留日的高級知識份子，而啓敏名目上雖然是地方首富的養子，實際上卻僅是個連小學都沒畢業的一介貧農。社會地位、學識涵養、學歷懸殊甚大，但就同樣是出生於同一時期，同一地區的人民，背負著相同的歷史背景，又一樣經歷過被殖民政策煎熬的經驗。就這一點而言，此兩個人所面臨的殖民政策的命運，應相差無幾。因此，本論文可以合理將男主角啓敏，視爲作者張文環的分身看待。

而作品內容敘述至昭和 19 年盛夏時分〈第六章之五〉。因此，研判《滾地郎》是描繪陳家兩老結婚的明治 42 年〈1909〉至作品結束的昭和 19 年〈1944〉35 年間，主角啓敏夫妻一生的見聞、體驗。甚至可以說是將近日據時代三分之二左右時期，作者張文環或台灣人們共同的生活記憶與體驗談。

第二點：透過《滾地郎》在日本用日文發表，呼籲日本人民在面臨台日斷交的政治議題上，應該多給予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多一些關愛的眼眸。《滾地郎》正是作者張文環沉澱 31 年後的日本殖民回憶。可視《滾地郎》爲作者張文環的自傳性小說。

張建隆對於《滾地郎》創作的過程，有如下的敘述[9]：

> 一九七二年起，張文環於經營日月潭飯店之餘，每天清晨三時半起牀寫作二小時，無日間斷，歷時二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息於斯的人〉[10]。

由上述資料得知，張文環於 1972 年開始《滾地郎》的小說創作。此乃是自戰前 1944 年的最後一篇作品〈雲之中〉後，睽隔 31 年後才重新開始的創作。鑑此，張文環的重新執筆，一定有其相當的原委。話說 1972 這一年，正值日本與中國大

來看，文本所列為農曆12月中旬，新曆應應該提前2個月左右的明治43年春天。由此推斷，啟敏明治43年應該是5歲，明治39年〈1906〉出生才對。然而認定啟敏於明治41〈1908〉出生，主要是基於昭和13年的時間點並考量與其它重要人物的差距的年齡後，所推算出來的。在此再次重申，陳啟敏的養父陳久旺與吳錦結婚的「明治四十二年的農曆十二月中旬」〈第一章之三〉，應為1909年。

[9]張建隆，〈生息於斯的「滾地郎」—張文環〉，收錄於張恆豪編《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10》(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初1991)，頁268。

[10]原日文題名為「地に這う者」，至今有《滾地郎》、《生息於斯的人》、《爬在地上的人》(此為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中的譯名。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三種中文譯名。

airiti

陸正式建交，同時與台灣斷交的一年[11]。在此歷史意義重大的時刻，張文環重拾筆桿，寫作《滾地郎》訴說著與即將斷交的日本國之間的關係。因此，創作之時，曾經長期受日本孕育、受日本殖民的張文環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而從《滾地郎》在日本用日文出版的事實，應可揣摩出張文環的創作動機。《滾地郎》文中，毫不避諱地使用許多台灣俗語「氣死了」、「死皇帝不如活百姓」等，也刻意多處使用了日文諺語「老來從子」、「雨過天青」、「有錢能使鬼推磨」等，並陳述了許多男女姻緣、結婚、婚宴、產婦吃麻油雞坐月子、過年拜訪他人的禁忌、養子童養媳制度等台灣的民俗風情。其中最奇特的是，描繪日據時代台灣人小老百姓與管理階級的日本人間譜出的「超越異民族的友誼」。殖民時代仍免不了訴說著殖民統治階層在台灣施行的種種暴政暴行，而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但《滾地郎》的主軸，大半是在推廣台灣事物給日本讀者認識，傳達給日本國民，日據時代的台灣曾經是與日本那麼關係緊密夥伴的訊息，對日本、日本人釋出善意。此可解釋爲，張文環呼籲日本人民在面臨台日斷交的政治議題上，別因政治利益的介入，過度傾向中國，應該多給予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多一些關愛的眼眸。此應是深藏於張文環內心的創作《滾地郎》的動機吧！

回顧張文環與日本的關係，更能了解《滾地郎》中表達出對日本、日本人善意之舉，是其來有自。張文環自小學習日文，在懂事後 1927 年又赴日留學。1938 年偕同日籍妻子回台後，1941 年負責雜誌〈台灣文學〉編輯，鞏固了在台灣文壇屹立不搖的地位。1944 年奉了台灣文學奉公皇民會的命令，創作出〈雲之中〉之後旋即息筆。從人生成長閱歷而言，無論甘心情願與否，張文環自始至終與日本這個國家，有著切割不斷的關係，甚至可謂日本是張文環精神上的母國。1945 年台灣光復後，目睹台灣社會內部發生 1947 年的 228 事件，殺害無辜知識份子後的張文環，期盼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用心經營台灣的夢想，因此而破滅。1946 年張文環曾當選爲臺中縣參議員，用中文於報章雜誌上發表〈從農村看參議會〉[12]、〈台拓的土地問題〉[13]，積極抒發建言。或許是看破政治的複雜，不再積極涉入政治圈吧！張文環 228 事件之後，1951 年轉向完全陌生的保險業、銀行業、旅館

[11]1972年9月29日簽署中日外交協定，同時斷絕與台灣的邦交。同年12月15日決定於北京設立日本駐華大使館。〈引述自川崎庸之代表監修，《閱讀年表式的日本史》，東京：自由國民社，1993‧初版1991，頁1045〉。

[12]1946年5月21日發表於《台灣新生報》。

[13]1946年8月19日發表於《台灣新生報》。

業發展[14]。終於在台日斷交的 1972 這一年，重新開啓文學創作，完成《滾地郎》小說[15]。張文環心中或許不願意看見中日斷交的歷史殘酷的一幕，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回憶台灣包括自己與精神上母國日本相關的種種。清朝統治台灣，卻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又因日本戰敗，台灣得以回歸中國祖國的懷抱。但因國共內戰挫敗的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時，國民黨軍隊如同逃難般蜂湧而至。接收台灣之際引發了 228 事件，使得光復後的台灣全島，馬上陷入白色恐怖當中。好不容易回歸平常的生活步調時，竟又被迫台日斷交的命運。歷史的激流下，台灣、台灣人的命運，真的連自己都無法掌握。且主權者輾轉易主，完全必須聽命於外來政權，未來任人擺佈。在台日斷交的時刻，重新思索著起起伏伏的台灣命運，張文環更是百感交集、有無限的感慨吧！

其實，當日本統治台灣結束後，意圖將此日本殖民台灣 51 年的記憶，融入成小說題材的文學作家，除了張文環之外，另有鍾理和(1915-1960)、鍾肇政(1925-)、李喬(1934-)三人[16]。鍾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中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17](中文)就是其成果的展現。鍾肇政進一步闡述、說明此《台湾人三部曲》早於 1964 年動筆，1967 年完成《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沈淪〉公諸於世[18]。見此，張文環與鍾肇政最大的不同，就是於中日斷交的 1972 那一年開始動筆，試圖描繪自己的殖民地經驗，且用日文發行於中日斷交後的日本國內。此番作爲更別具意義。此點亦可當作旁證，印證出《滾地郎》是張文環回憶精神上的母國日本與本身所受的日本殖民經驗。理所當然視《滾地郎》爲作者張文環的自傳性小說，亦是合情合理。

另舉台灣國內用日文命名自傳小說的李昂《自傳の小說》一書，作爲佐證。2000 年出刊的《自傳の小說》，是以日本統治期下的奇女子謝雪紅的一生爲題材所撰寫的小說。小說的結尾處正可以呼應《滾地郎》當作張文環的自傳性小說的

[14]柳書琴編，〈張文環生平年表寫作年表〉，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第8卷》(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頁148。

[15]根據柳書琴編，〈張文環生平年表寫作年表〉看來，張文環晚年留下些許未標明創作時間的未完稿。像是〈日月潭羅曼史〉、〈故鄉在山裡〉、〈地平線的燈〉，據家屬推測應於1965年任職於日月潭大飯店時所寫作。因證據不足，無從考察起，又加上未公開發表，於是在此認定《滾地郎》為繼1944年〈雲之中〉之後睽隔31年完成的完整小說作品。

[16]鍾肇政，〈後記〉《台湾人三部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1110。

[17]李喬，《寒夜三部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

[18]同前揭鍾肇政書，頁1110。

合理性。《自傳の小說》文本中記載，謝雪紅「生在一九〇一年，日人領台後的五年」[19]。此與 1909 年左右出生的張文環、陳啓敏兩人歲數相差不多，可視爲同時期的人物。而於 1952 年出生的現代女性作家李昂，與作品主角謝雪紅年齡相距 51 歲。生活的背景又有日本統治時期與國民黨統治時期之不同。然該小說結語處，明記著：「謝雪紅。我要找尋的，又豈只是妳的一生。謝雪紅，妳的一生，我的一生……我們女人的一生」。從此結語可以看出，在早 51 年前出生的謝雪紅身上，作者李昂看到自己的影子、台灣女人的命運，而大膽以謝雪紅的一生代表了自己甚或是女人的一生，作爲小說的總結。由此脈絡引申類推，視《滾地郎》爲與主角同年代的作者張文環的自傳性小說，其可行性應不容置疑。

雖然《滾地郎》一作，被葉石濤譽爲「最清晰地透露出張文環先生的思想、生活態度以及堅強的民族精神」[20]、柳書琴評價爲「至今日台間最爲知名的張文環代表作」[21]。然而目前蓬勃發展的後殖民地研究成果當中，對於《滾地郎》的重視或是相關論述的發表，卻無法與葉石濤、柳書琴兩位臺灣文學研究專家給予的評價成正比[22]。於是，本論文秉持《滾地郎》爲一部張文環的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的基調，從中探究張文環個人的精神、寫作風格的成長。

3.日本殖民政策下張文環的見聞

如前述，《滾地郎》作品第一章之一的開始，即點出總督府發表的改姓名政策的「昭和十三年」。顯而易見作品是聚焦於此政策之上。啓敏養父陳家於昭和十三年提出改姓名的申請，若干時日後即獲准改姓名。陳家的目的無非是希望陳家親骨肉武章能順利由國民小學的訓導高昇爲校長，光耀門楣。而獲准改姓名後，陳家成爲該村落擁有日本人姓名第一個家庭，在該區域成爲「被殖民地人中的最高階級」〈第六章之三〉的待遇。而伴隨總督府的改姓名重要政策發布與實施，在台灣的社會產生了怎麼變化？張文環有以下近距離的觀察。

3.1. 殖民當局實施改姓名政策的戲劇張力

[19]李昂，《自傳の小說》(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71。

[20]同前揭葉石濤論文。

[21]同前揭柳書琴論文。

[22]《滾地郎》相關代表論述：葉石濤，〈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的人>〉。張建隆，〈生息於斯的「滾地郎」—張文環〉。柳書琴著中島利郎譯，〈張文環『山茶花』解說——部落から都会へ、進退窮まった植民地の青年たち〉。葉石濤，〈張文環文學的特質〉。

當武章與父親商討改成怎麼樣的日本姓名時，舉出了因台灣人不容易區別出日文音讀與訓讀的不同而發生的發音錯誤的笑話。武章的師範學校同窗好友父親改名爲「神田德太郎」，街上的人們卻因發音不正確，說成「死了就賺一把」。武章又擔心如果將本姓的「陳」的「耳東陳」的耳字邊拿掉，只留下「東」字的話，會被揶揄成「阿東哥」的笑話。左思右想地想出個「千田」，卻又遭逢鄰里「怎有晚輩小孩幫老爸取名字的呀！無法無天到極點，真是世界末日到了！」〈第一章之一〉的冷潮熱諷。甚至將「千田〈Senta〉」叫錯成「千田〈Chihta〉」，極爲少數人能叫對。此時陳家老父心中，產生了些許對兒子武章的不滿情緒。

> 丟棄了五十多年叫習慣的名字，被叫了父子處心積慮想出的名字，卻完全沒有同感。明明台灣人，名字卻要改成日本人的名字，年輕人還好，像進入半百歲數的人而言，完全沒有生為日本人的感覺。若在日本國內就用不著吃這麼多苦頭，在台灣吃虧的多，一點都佔不了便宜。經濟來源就在台灣社會，光名字改成日本人，也沒什麼好處，反倒怨恨起都是武章一人要昇校長惹的禍。〈第一章之一〉[23]

而不會說日文的武章母親，更是不敢像平常一樣上街買東西。街上的調皮鬼故意用日文說：「太太！要桃子嗎？」。因爲日文「桃子」的發音與台灣話的「摸摸」發音相近，不禁讓旁人想成雙關語的台灣話「太太！要摸摸嗎？」。面臨此窘境的武章母親，心中也不勝唏噓。

> 歲數都這麼大了，根本不用成為日本人。真想輕鬆死去，但是想到孩子的將來，也只能忍耐了。〈第一章之一〉

陳家兩老心中的唏噓，正是因爲改成日本名字之後，無法適應接踵而至的問題所導致的。而兩人仍願意改姓名，主要是基於護子心切，望子成龍的心情。相較於陳家二老，武章兄妹倆年輕人，樂意改姓名。因爲改了姓名，出入公家單位被叫日本名字，得到如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心中感到倍受重視。但改姓名者的戶籍上，被劃上圓圈做記號，以便與真正的日本人做區隔，皆通稱爲「丸臺日本人」。此稱呼原本因業務程序之需，僅戶政單位的人員知曉而已，而「丸臺日本人」

[23]引用範本是使用日本現代文化社授權鴻儒堂印刷出版的日文版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台北：鴻儒堂，1975）。以下文的引用，以中文呈現，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

airiti

的說法，卻竟不脛而走，傳遍鄉里。此傳言令剛風光改完姓名後的陳家，顏面盡失。此時武章深刻體驗到那是民族思想的作祟。曾經以嚴正的口吻，告訴希望透過改姓名的手段，得到與真正日本人一樣對待的父親說道：

改姓名只是為了在會上混生活的方便手段罷了。當局者都光只會倡導一些什麼大東亞光榮圈、什麼八紘一宇的，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總之那都是喊喊的口號、口號而已。〈第一章之一〉

明顯地武章在此是識破了總督府實施改姓名的兩手策略。縱此，武章仍執意逢迎策略，說穿了只不過爲了自己一人官運亨通罷了。而陳家另一成員養子啓敏，拜武章改姓名之賜，也被改成「千田真喜男」。此消息不是由陳家口中得知，而是山裏撿柴夥伴告知的。連名字的意思，也是經過山裏撿柴夥伴細心解釋後才懂的。從下一段文章中可以看出，因改姓名而造成當事者啓敏相當困惑，結果只讓自己變得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被改成日本人名字，真是鬱卒。首先自己不懂日文，只因為自己是村長的養子，才獲得日本式的名字的恩寵。這雖然是好事，但對啟敏而言自己就變成既非日本人也非台灣人。〈第一章之一〉

獲准改姓名成爲「千田真喜男」的啓敏，生活上產生諸多不便，於是心中叨唸著弟弟武章的不是。

當了訓導的弟弟的傢伙，真是多事找我麻煩。自己改姓名就好了，牽連上我，今後除了名字之外，生活也變得雜亂無序。〈第一章之一〉

綜合陳家二老以及養子啓敏的反應，不難看出陳家改姓名，只圖武章一人官運亨通，其他家人則被波及，生活步調因此而錯亂。而熱衷於改姓名後的武章，直至作品結束的昭和 19 年，沒當上國民小學校長，可謂美夢破碎。雖此，阿蘭偷看到叔叔武章自修英文與中文〈第六章之四〉。武章隨著局勢的改變而離棄日語，開始學習中、英文的巨大行爲轉變，顯現出武章對時代動脈極度敏感。而看到掌握時局變遷，隨時調整處世方針的知識份子武章行爲，身爲兄長的啓敏才有以下的自覺。

自己從頭到尾都受騙，就因為自己沒有唸書，不斷吃苦。而說阿蘭丈夫出

airiti

征可以獲得金鵄勳章的老弟，因為念了些書才能免除災難臨身。一感覺到情勢不利，迅速抽身脫離災難。〈第六章之五〉

啓敏除了悲嘆自己因爲沒有讀書一生受騙的命運之外，造成如此的命運大不相同的原因，關鍵乃在於擁有知識與否。有了知識就能熟悉局勢變遷，尋找趨吉避凶之道。此爲受正式教育武章的處世方針。亦是日據時代受教育的知識份子的寫照。而武章果真如啓敏所欽慕一般一帆風順嗎？武章有如下的想法。

想出私下學習英文中文，來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萬一日本戰敗，像自己不是真正日本人，戶籍上卻寫著日本人姓名的人，未來下場又會如何呢？〈第六章之四〉

武章的想法中，有著武章的企盼與擔心。武章改學中、英文，主要想抓住新時代的動脈，期盼下一個新時代中的躍進。而除了期盼之外，武章也擔憂新局面下，不是日本人卻有日本人名字的難堪。此正也道出，日據時代期盼功成名就而改姓名的台灣人們內心的苦悶與矛盾。武章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武章同其他多數人一樣，日本當權時，處心積慮藉由改姓名，來達成功成名就的夢想。而事實上，人算不如天算，總逃離不了時局的驟變，而功虧一簣。

諷刺的是原先不願改姓名的啓敏，終於隨著成家與戰爭越發激烈的大環境改變，一家四口短暫享受了改姓名後的些許方便。因爲改姓名，讓啓敏成了山村中唯一擁有日本人姓名的農夫「千田真喜男」〈第六章之二〉。包括阿蘭因此得到庇祐，順利地從秀英養父家過戶過來，恢復戶籍成爲「千田蘭子」〈第六章之二〉。又在因戰爭情勢緊迫，總督府嚴格控管糧食物資時，啓敏感受的「被叫千田桑感覺像似護身符一般」〈第六章之二〉，享受著「千田桑因爲是準日本人，一定是忠貞愛日本國，不用搜家」〈第六章之二〉的法外開恩。此種待遇絕非當初單身的啓敏所能設想到。

在此藉由主動改姓名的武章與被動被改姓名的啓敏的對比，鋪陳出積極改姓名後的知識份子，失望落空了。而無意藉由改姓名獲得利益的純樸農民，卻意外享受福報的諷刺劇。知識份子藉由改姓名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爲日本人的前瞻遠矚，其實從武章的例子，不難看出是否定的答案。而陳家老父的喟嘆中，亦可得知一二。陳家老父看到自己親生兒子的世故而曾喟嘆說：「知識是爲了隱蔽人類的狡猾而學習的？或是爲了追求真理而學習的？」〈第一章之一〉。

而現實上的張文環，在日據時代堅持坐不改名立不改姓[24]，但對於改姓名的台灣人，也沒有隨意加以批判。當殖民當局以強勢逼迫張文環改姓名時，張文環以「八紘一宇」、「大丈夫之道」等大義名分，讓前來說服改姓名的憲兵無言以對[25]。而張文環在《滾地郎》中拋出「民族」的議題。統治當局宣稱台灣沒有民族問題，台灣當地執行者又奉承阿諛，故意視若無睹。自認「台灣才沒有民族問題，大家都是一視同仁。不同的只是姓名而已，只要改成日本人姓名的話，同化政策就上軌道了」〈第一章之一〉。對此張文環沒有具體下註解。僅透過藉由知識份子武章與農民啓敏的對比，對日據時代被當作魚躍龍門手段的改姓名，表達出意見。即是知識份子子汲汲營利卻落得美夢破碎，而執著土地踏實耕種的農民，無意間卻蒙受其利。此與藉由改姓名達到同化目的願望而相違的諷刺結果，正增添改姓名的目的與改姓名後的結果逆轉的戲劇張力，與自古至今引以爲處事箴言------「無爲而爲」的濃厚色彩。

3.2.言語差異中衍生出的趣聞

伴隨總督府的改姓名政策等，在台灣引發了一連串語言差異的趣聞。張文環亦敏銳觀察到，台灣人因應外來語言差異的特殊能力與適應方式。

諸如上述的台灣人將改成日本人姓名「神田德太郎」的人，叫成了「死了就賺一把」。陳家不敢省略陳字的部首改成「東」，亦是怕被揶揄成「阿東哥」的趣聞。顯見作者張文環是用幽默方式，處理了跨言語而產生改姓名者與無緣改姓名者之間紛擾的問題。無緣改姓名者只能用故意發錯音的方式揶揄改姓名者，來表達自己酸葡萄的心理。此外當時台灣人間還流行一種「橘子皮式的日文」[26]，來與日本人疏通意思。此種不管日文文法正確與否，目的求達到溝通意思而想出來的便利方式，一方面點出言語隔閡難以突破的困難。一方面道盡了台灣人利用巧思，努力在夾縫中突破語言籬籬，克服困難，存活下去。

[24]同上述全集第7卷〈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73頁。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1979年8月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2號。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25]池田敏雄〈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同上述全集第8卷，65頁。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1979年8月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2號。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26]文本第三章之三中提到，有個擁有6個小老婆的台中富豪到日本遊玩，自豪不因語言不通而減少旅遊興緻。旅遊中想納該餐廳的女中為第七個老婆，雖然最後宣告失敗。但富豪完全不在乎日文文法而使用自創式的日文，此方式被戲稱「橘子皮式的日文」。源自於該名富豪要女中剝橘子來吃，就對著該名女中說了「橘子和皮，莎喲娜拉」。

有關跨語言隔閡的問題，張文環早就注意到了。早期的論述，例如〈我的文學心思〉[27]中，即表達了在從事日語創作時，面臨到日語語言表達上的困難[28]。又於〈獨特的存在—今年也要奮鬥〉一文中表示：「尤其從事文學的本島人和內地人相比，我想更需要有二倍三倍的心得才行，首先要征服言語的運用，不然就沒有表現的手法可言」[29]。且於生平第一篇長篇小說《山茶花》發表前的預告文中，也毫不掩飾地表示：「描寫舊式鄉下生活，最爲痛苦的事，無法盡情用日語表達出來」[30]。綜合張文環的主張，可以看出張文環本身透過日文創作，體驗到跨語言的無法伸張的困境。而在晚年的最後創作《滾地郎》中，亦對跨語言的問題多有所著墨。不同的是，張文環的觀點改變了。改變成從被殖民地的台灣地區人民的角度，切入這場因帝國主義殖民事實而引發的語言紛爭，訴說著當地居民的自救之道。同時亦點出總督的改姓名策略下，台灣人民被分化成無緣改姓名與改姓名者的兩種。無緣改姓名者，忌妒改姓名者。而改姓名者則自以爲高人一等而傲視無緣改姓名者。兩者間情感逐漸疏離、彼此猜疑敵對。

雖然張文環觀察語言的視點，早先是站在身爲文字工作者的角度，注意到如何使用流利日語從事文學創作，逐漸才關懷殖民地人民如何使出奇招，使用不具日文文法的日語，以達到疏通意思的目的。從特定一部分的知識份子的角度，轉而放眼台灣蒼生，此時張文環的視野似乎變得寬廣許多。無論如何，可以確定張文環是一持續關心著異民族間，溝通、表達之語言議題的。

在異民族間的語言溝通議題上，張文環將清朝統治台灣所引發的語言障礙和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語言障礙，拿來相提並論。此點不難窺得張文環對「異民族」一詞，有獨特見解。

---

[27]同上述全集第6卷164頁。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1943年8月16日《興南新聞》，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28]此點與鹿子木龍在〈作品和文章—關於散文水準的提昇〉一文當中陳述的見解，不謀而合。該論者點出此乃外地作家中常見的問題，原因歸咎於「無法完全掌握日語所致」。資料引用自上述全集第8卷43頁。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1942年10月《台灣文學》，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29]同上述全集第6卷43頁。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1940年1月1日《台灣新民報》，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30]張文環〈山茶花—後天開始連載・作者的話〉，刊載於1940年1月21日《台灣新民報》。該文章以日文創作，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引用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台灣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2》綠蔭書房(2002年），頁348。

明治時代的殖民地台灣，雖然有異民族進來台灣，清朝時代的台灣，統治者也不知曉台灣話。官員與民眾間不透過口譯的話，就像鴨子聽雷一般，完全無法溝通。又加上官員與民眾間多個高高在上的官衙門，更難以接近。日本人進來台灣後，增加個異民族的隔閡，彼此的意思疏通，更不容易。〈第一章之五〉

日本與台灣雖爲異民族，日本統治台灣時所碰到的是語言障礙問題。其實早在同爲漢民族清朝統治台灣時，就已經存在語言障礙的問題了。除了語言的障礙外，加深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距離，不待言是異民族的隔閡。而加深漢民族清朝與台灣人的距離，則爲官僚主義的阻礙。不管台灣人受到清朝統治抑或日本統治，伴隨著「統治」的事實發生，都同樣產生了語言障礙與隔閡的問題。由此觀之，異民族抑或同漢民族的統治，對被統治的台灣而言，都是一樣處於被擺佈、控制的命運。換言之，特意將清朝統治與日本統治相提並論的張文環，其用意乃是爲了抒發「異民族」一語，於《滾地郎》一作中有不同涵義的見解。

3.3「異民族」的特殊涵義

《滾地郎》中提到「異民族」一語，初見於上述清朝統治台灣與異民族日本統治台灣相提並論處。而當局採取將核准改姓名的台灣人，通稱爲「丸臺日本人」以便區隔真正的日本人的策略，武章看穿此舉用意，一語道破：「那是民族思想作祟」。並進一步闡述「把改姓名當作是讓生活方便的一個手段就好了，什麼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光只會喊喊一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總之，是口號，只是個口號而已」〈第一章之一〉的武章，毫不客氣明白告訴父親：「所謂民族思想，在殖民地區隨著當局者想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的東西，太認真當一回事的話，根本明天吃什麼都不知道，活不下去」〈第一章之一〉。日本發布實施改姓名後，又獨創出「丸臺日本人」的稱呼，對此武章表達上述的見解，與日本當局原意，相差無幾吧！日據時代被統治台灣人，即使是改了姓名者，仍與真正的日本人間，還有一大段距離。

異民族的嚴苛的統治下，仍超越異民族友誼存在。具體的「超越異民族的友誼」的字眼，見於《滾地郎》第二章之二中。描繪即將離職的中山巡查夫人與東村村長夫人間的異國友誼。而於第五章之六處，描述了被養父當場逮著與啓敏曖昧關係，而強行帶至派出所的秀英與啓敏，在派出所得到吉田巡查的相挺，才能結爲夫妻一事。事後兩夫妻將吉田巡查當作媒人，逢節送禮答謝。此又是「超越

異民族的友誼」的一例。而吉田巡查夫人將小孩的舊衣物以及畫本、書籍送給阿蘭，開啓阿蘭的知識視窗，灌漑了阿蘭的心智。使得窮鄉僻壤的農村女孩阿蘭，也能知書達禮，應對進退得宜。應可爲「超越異民族的友誼」，再添一樁美談。

當然《滾地郎》文中，不乏控訴殖民日本當局者的暴政暴行。諸如：第六章之二處，提到丈量「風頭水尾」田地位置、層層監督依據田地面積精算出須繳交的稻穀數量、嚴格監視控管統治異民族台灣。第六章之四處，甚至隨著戰爭情勢危急，商業警察將隱藏糧食的人打得半死、將教科書上的「支那」字眼塗改成「中國」的商科學生被憲兵打死的傳聞不斷。對此張文環用「不經由法院判決，軍人如果能殺國民等於否定國法。沒有國法，人民變得沒有依靠，必然感到世界末日的來臨，那又該如何呢？善良的農民，只能仰天嘆息」〈第六章之四〉的措詞，來表達日本軍國主義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怒吼以及無奈。

隨著戰事逼近，日本當局開始徵志願軍、實施徵兵制，徵調台灣人充當日本兵，上前線戰場爲日本國賣命。在台灣本島的老年人見此，悲嘆說這輩子第一次遇到這麼悲慘的事。而出征的台灣年輕人口中喊著：「拋頭顱、灑熱血的台灣人，才能真正成爲日本人」〈第六章之五〉。此言一出，感動得台灣知識份子也爲之熱淚盈眶。不上前線、躲在戰爭後方台灣本島日本軍人聞之，馬上讚揚說：「這樣傑出的青年，是日本在台灣數十年來勵行的教育成果」〈第六章之五〉。戰況急迫，日本教育台灣人要爲日本國拋頭顱、灑熱血，才能當上真正的日本人。此套說詞，似乎與昭和 13 年發布改姓名政策的主旨，相違背。繼之，《滾地郎》文中亦披露，全面嚴格管控物品、分配生活物資、廢寺廟、禁穿台灣服等強壓政策，藉此抒發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統治下臺灣人的憤怒。此絕非張文環一己的親生體驗，應是日據時代生活過來台灣人普遍的集體記憶吧！只是日據時代集體灰色惡夢中，張文環特別穿插了「超越異民族的友誼」的彩繪。此獨特的寫法，凸顯出張文環對「異民族」的不同詮釋。異民族高壓統治之際，仍有超越異民族的友誼，人類普遍存在的善意。

4.觀察台灣社會內部的現象

張文環除了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政策提出見解外，本身對台灣社會亦有深入獨到的觀察。如下簡單敘述張文環的見解。

4.1 往下紮根，耕耘土地的可貴農民奮鬥的精神

作品名《滾地郎》，狹隘定義指的是主角啓敏。廣義當然指的是整體的臺灣人。

第六章之二處明白寫道：「盡人事聽天命是啓敏一家的人生觀」。而啓敏秉持著是「仰賴土地，認真農耕是開拓人生的唯一道路」的信念。並體認到「土地跟人一樣呼吸著，不持續耕種，是不會長出穀物」的回歸大自然的道理。而日本當局以戰爭爲名，四處搜括物資、嚴格控管流通、分配，妻子秀英看到擔心因此生活困苦的啓敏，而安慰他說道：「人啊！只能順其自然。戰爭也是不是我們管得著的事。統治當局想拿就儘管拿走吧！才不相信連山啊土地啊能拿得走」〈第六章之三〉。被統治的悲慘台灣人，只能任由日本軍國主義壓榨、剝削。台灣人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往下紮根、踏實耕種土地。自清朝而至日本，外來族群來到台灣這片土地掠奪，嚴峻的統治政策下被剝削的台灣人民，不就是一直仰賴台灣土地，一路困苦地生活過來的嗎？仰賴土地是唯一生存的希望，也是千古不變的法則。此乃農民奮鬥精神可貴之處。也是逆境中求生存的唯一之道。

相較於貧農的啓敏，可視女兒阿蘭與弟弟武章兩人，爲台灣人知識份子的代表。阿蘭吸收婦女雜誌的知識，成爲擁有日本名字的「半個日本人」〈第六章之五〉。而疼愛阿蘭的武章則是身任訓導、一副「戰爭時的標準日本人」〈第六章之五〉姿態出現。即使丈夫被徵調至前線出征亦不以爲意的阿蘭，終究因爲丈夫的戰死而失神落魄。而武章極力改姓名以圖高昇校長一職升官，卻夢想幻滅。知識份子的人生潰敗，似乎證明農民努力耕耘土地的奮鬥精神，才是台灣人精神的具現，困境中求生之道。

作品結尾，啓敏因愛女心切，一得知女婿戰死消息即刻趕到阿蘭家，因傷心過度而猝死於女婿靈前。妻子秀英耳聞丈夫猝死，冒著空襲危險，手牽幼女、懷抱幼子趕往阿蘭家的途中。此結局令人鼻酸、心痛。鼻酸之餘，眼前不禁浮現出玩弄善良百姓的歷史無情的一面。

不管歷史的無情、農民精神的可貴、知識份子的潰敗，都是張文環透過殖民經驗中獲得的體認，同時也應該是屬於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4.2.男尊女卑的本質

《滾地郎》文中出現三次將女人的命運比喻做「菜籽命」〈第四章之二、第五章之三、第六章之四〉。兩次是出自身爲女人秀英以及養母阿媛的口中，一次出自養父明通的口中。秀英被已娶別人爲妻的養父母的兒子仁德強暴後生下女兒阿蘭，當時養父明通失望地說：「女人像菜籽命，賠錢貨」〈第五章之三〉。歧視女人的男人心理，由此得知。「女人是菜籽命」的命題，除了出現在《滾地郎》外，多次出現於擅長描寫女人心理的張文環其他《閹雞》〈1942〉等作品當中。可見男尊

女卑、歧視女人的觀念，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如同秀英曾經悲嘆著：「女人和麻油菜籽一樣，撒在哪裡長在哪裡。女人隨著嫁的夫婿而命運大不同。是好是壞，只能聽天由命」〈第六章之四〉。台灣女人是否能富貴過一生，取決於出生與結婚兩件事。出生富貴人家，總比別人更有機會過好日子，女大當嫁時，父母親依門當戶對的標準，選擇不錯的夫家。而出生在窮困的中、下層家庭，注定要過苦日子。只能透過結婚，再豪賭一次命運翻盤的機會，但往往是機會渺茫。於是，台灣女人普遍擁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宿命觀，無奈地哀嘆「女人像麻油菜籽」的命運。

台灣社會中男尊女卑的情形，到處可見。而經過張文環的筆觸描寫的夫妻關係，可以看出張文環對男女關係有獨特的見解，破除一般男尊女卑的迷思。爲了清楚比較出異同，擬將《滾地郎》文中描述的三對夫妻，亦即是上流階層啓敏養父家的養父久旺與妻子吳錦夫婦、中下階層秀英養父家的養父明通與妻子阿媛夫婦、台灣社會最下階層養子童養媳啓敏與秀英夫婦三對夫妻，作爲比較的標的。

陳家發跡於日據時代久旺西村村長、改姓名之時。在這之前是經營山村中三家老店之一「金源成商店」。該店是明治時代傳承下來的。久旺與吳錦夫妻透過傳統的媒妁之言，經過傳統式迎娶而成爲正式夫妻。久旺在書房學習漢學之後受了四年的日本教育，在山村中可稱得上「知識份子」〈第一章之四〉。而迎娶的吳錦「既識字有長得標緻」〈第二章之四〉。從別人的眼中看來，倆夫妻是「有學識的恩愛夫妻」〈第二章之三〉。然這對夫妻在人生上遇過兩次考驗。第一次考驗描述於第一章之六至第二章之四間，將其梗概介紹如下：結婚半年後，久旺因生意應酬常上酒家，喜歡上酒店小姐秀琴。吳錦得知後，想辦法買回久旺送給秀琴當訂情之物「刺繡錢包」。再拿此「刺繡錢包」當證物，向久旺雙親哭訴，結果久旺父親活活地氣死。久旺於是心生對妻子吳錦的不滿，但又感動於吳錦盡心打點父親喪禮、服侍母親的賢慧模樣。終於除去心中芥蒂與吳錦重修舊好。第二次的考驗描述於第二章之五，情形大概如下：領養啓敏當養子隔年，親生骨肉兒子武章出生，隔年女兒淑銀出生。當武章三歲時，陳家找來個年約 15 歲，名叫素麗的女孩照顧他。久旺趁著妻子帶女兒回娘家過夜時，與素麗同房睡覺，發生不倫關係。事後得知此事的吳錦，馬上找來素麗父親談判，給予金錢了事。心中仍想納素麗爲妾的久旺，對於吳錦處理的方式極度不滿，甚至心中詛咒妻子爲「狐狸妖精」。但隔天中山巡查登門來訪，以「夫唱婦隨、模範家庭」爲理由，要久旺接下空懸多日的西村村長要職。此時久旺才恍然大悟，明白要不是妻子的果斷處理了與素麗的不正常關係，自己就無法享受鴻運當頭，當不上村長。自此而後，久旺當妻

子吳錦爲自己招來福氣的福神，凡事聽命於老婆大人。兒子畢業於師範學校，女兒也上了女子學校，昭和 13 年陳家順利完成改姓名，成爲山村中僅次於日本統治階級之後，台灣人中最高層級的家庭。此份榮耀應該歸功於久旺妻子吳錦的「相夫教子」的功勞吧！

而《滾地郎》第四章、第五章中，轉而集中描述屬於台灣社會中、下階層的秀英養家王明通夫妻一家人的故事。明通夫妻的結婚，沒有過多著墨。只提到阿媛本爲良家少女，當初嫁給獨子的明通時，王家在山村中還是數一數二的雜穀店。明通立志想在日據時代中當個男人中的男人，所以習武學藝。因爲沒有考量習武在日據時代沒有出路，於是空有武藝在身的明通，最後沒落成幫人抬轎的轎夫。妻子阿媛連想也沒想丈夫會落魄至此。雜穀店因經營不善後阿媛改賣起豆腐，又因明通看不慣妻子與客人打情罵俏做生意，與人打架受傷後，生意一落千丈。之後阿媛轉型開了個日常用品的雜貨店。明通本性不喜歡認真工作，每天空想著藉由賭博來完成一攫千金的美夢。可是賭博又怕惹火老婆大人生氣，明通只好每天偷閒、被動等待客人上門，賺得些微的收入。遇到這種沒出息的丈夫，阿媛更是積極賺錢，守住賺來的一分一毫的金錢。於是，明通家的經濟重擔，自然而然地就落到阿媛身上。

阿媛生意手腕厲害，用「孫子兵法」方式經營雜貨店，生意興隆，令旁人瞠目結舌。還傳說：「這個女人啊！如果是在日本出生的男人的話，一定可以當上縣長大人」〈第五章之一〉。阿媛不只免費提供喝茶、聊天的地方，來討到男人的歡心，讓他們順便購物回家。而也知道對女人們要大方以對，與她們結爲姐妹淘。於是，不敢拋頭露面的家庭婦女們的口中，只有羨慕阿媛的作風。從沒有一個人說阿媛的壞話。丈夫沒出息的台灣社會中下階層的王家，只有靠阿媛一女人撐家。

大篇幅關於第三對啓敏與秀英夫妻的描寫，是在第六章。將兩個人結爲夫妻的坎坷過程，簡述如下：啓敏雖然是大戶人家陳家領養的養子，自武章出生後就一直被冷落，小學只唸一年就匆匆結束學校生活，上山撿柴。在陳家只不過是聽從煮飯阿春婆命令，撿柴、打雜的免費長工。而秀英是王家領養的童養媳。打算長大成人後讓她與兒子仁德成親。誰知仁德 16 歲小學畢業後，就離開家鄉到嘉義市，當汽車工廠的學徒。由於是鄉下人認真工作，被老闆看上，被選爲老闆親戚家的女婿。王家能與有錢人家結爲姻親而感到自豪。從沒有人關心過童養媳秀英的心情。仁德藉由幾次回家的機會，強暴了秀英，秀英未婚生子產下女兒阿蘭，也從不過問。啓敏一直同情這對母女的遭遇，因爲喜歡阿蘭，也開始對阿蘭的母親秀英懷著特別的愛意。甚至有一年的夏天，啓敏因看到被雨淋溼的秀英身材，

一時慾火焚身而強行施暴。由於秀英拼命抵抗不從，啓敏才沒有得逞。事後常從女兒阿蘭口中，得知啓敏不是壞人，逐漸對啓敏卸防、產生好感。終於啓敏 30 歲、秀英 25 歲那一年，兩人因相愛，在啓敏的山中小屋，發生肉體關係。卻被養父明通捉姦在場，帶至派出所要求巡查大人主持公道。雖然秀英是童養媳，但王家兒子仁德已經娶妻生子，就不構成通姦罪。於是，當時的吉田巡查在確認啓敏與秀英相愛的事實後，就網開一面要求王家與陳家和解。最後由陳久旺出資 240 圓交付王家當聘金，啓敏與秀英因而順利結婚。秀英帶著 8 歲的阿蘭，當晚即刻離開王家，前往啓敏單身以來充當休息用的山中小屋。開始三人幸福的家庭生活。

婚後秀英的勤儉持家的優秀表現，讓丈夫啓敏大吃一驚。讚揚自己的不識字的妻子秀英，擁有「經濟學博士」〈第六章之一〉般的頭腦。當陳家藉口說戰爭景氣不好，拿走家畜、糧食時，秀英也會差遣深得陳家歡心的阿蘭，下課回家途中，順道到陳家開的商店，要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啓敏雖然擔心這樣作法不妥，卻也不得不讚嘆妻子擁有「決斷力與生活智慧」〈第六章之三〉。又目睹秀英一心一意地認真經營家庭，更感到女人比男人務實，而自嘆不如。

啓敏夫妻在深山中組成的農家，生活上雖然貧困，精神上卻幸福無比。從丈夫啓敏的讚美中，不難看出這完全出自秀英慘淡經營的堅忍精神。

從上述解析出三對夫婦的實質關係，明顯地是與「男尊女卑」的社會標準相違的。三對夫婦雖然各處於台灣社會上層、中下層、最下層的三個不同階級。但任何的一個家庭，都是有位賢內助辛苦撐家，才得以延續家計、興旺家運。於是，表面上社會是以男尊女卑爲依歸，但實際上家中的大權，完全掌控在女人的手中。藉由《滾地郎》中實質的夫妻關係的描繪，可以掀起「男尊女卑」的帷幕，更看清楚被遮蔽的男女夫妻關係的本質。

5.張文環個人精神、寫作風格的面面觀

《滾地郎》是以第三人稱所寫成的長篇小說。全篇共分成六大章，各章設有小節陳述。因有歷史小說風範的取向，作品中出現了眾多具名或不具名的人物，隨著章節故事的推展，視點人物亦有所更動。第一章與第二章集中陳述陳家發跡過往。第三章以啓敏爲主，而第四章則以王家爲主。第五章敘述啓敏夫婦坎坷的情路。第六章重點在於啓敏夫婦婚後的山中生活。以日據時代爲背景鋪陳，加之眾多的人物與不同的視點人物，此獨特的小說技法，在張文環的小說群中，實爲少見。堪稱一大鉅作。簡單舉出四點特色，來了解作者張文環個人精神、寫作風格成長的一面。

5.1 摺疊鏡式左右並陳的描寫方式

多次提到日本當局實施的改姓名政策，藉著不熟悉日文訓讀與音讀的發音而鬧笑話的場景，分化出改姓名者與無緣改姓名者的兩個族群間的心理拮抗。再者因寄望功成名就而改姓名的知識份子與被動改了日本姓名的農民間，對比出夢想落空與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可視此爲摺疊鏡式、左右並陳的描寫方式。

另外響應「八紘一宇」口號，改姓名成爲日本人，豈知只被稱作「丸臺日本人」。而隨著戰爭逼近，又出現了拋頭顱灑熱血才能成爲真正的日本人的新說法。摺疊鏡式、並陳新舊不同說法的方式，其真僞的判別，留待讀者自己想像。

再者文中提及兩次杜鵑鳥的故事，一爲秀英告訴女兒阿蘭的故事〈第五章之三〉。一爲出現在啓敏自覺孤獨寂寞想念秀英時刻〈第五章之五〉。秀英告訴阿蘭，一對祖孫看到洞穴掛滿美麗的飾品，祖父怕兩人一起進去會有危險，於是獨留孫子一人在外，祖父一人進去洞穴拿取。誰知一進洞穴後洞穴的門馬上關起，任憑孫子如何呼喚爺爺，都沒有回音。最後孫子泣血而死，化身爲杜鵑鳥繼續呼喚爺爺。而啓敏將杜鵑鳥解釋爲，尋覓不著人生伴侶，泣血而死的化身。前者聚焦於祖孫之情，後者聚焦於男女之愛。並陳兩種不同詮釋說法，端賴讀者自己解讀。

異民族入侵伴隨語言的隔閡，當局高壓的統治政策，帶來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舉凡衣食住行、信仰、語言、思想、性命，完全被箝制、痛不欲生。其中也導入「超越異民族的友誼」的事例。好壞並陳的方式，增添了多元化的視野。

話說陳家兄弟武章與啓敏，武章爲爲知識份子的代表，依靠知識，掌握時代動向，贏得社會地位。卻在新時代來臨之際，徬徨不安。而啓敏夫妻爲農民的代表，依靠土地，深耕種植，贏得生活保障。在數次面對命運的艱難考驗，臨危不亂、安心立命。並陳知識掛帥與紮根土地的兩種不同人生面貌，提供讀者深思。

藉由吸收知識、思想改造成爲「半個日本人」的阿蘭，與成爲「標準日本人」的武章，在時代的激流下，阿蘭因戰爭失去至愛的丈夫，武章因日本的戰敗功成名就的夢想破滅。同時並陳知識造就的一得與一失，給予讀者無限的想像。

綜合上述，對同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說法或是迴異說法，作者不加以評斷，只善盡提供題材的義務，留給讀者極大的自由閱讀的空間。

5.2 力求參透事物的本質

一個名詞、口號、遣詞用句，會隨著時代往前推進、人們的認知，使用方式或許不同，但所代表的本質意義，是不會改變的。此番深刻的道理，可以從《滾地郎》關鍵詞「改姓名」、「異民族」，以及台灣社會的「男尊女卑」，得到印證。

airiti

日本統治當局於昭和 13 年發布改姓名政策，鼓勵高額納稅者透過改姓名成爲日本人。而戰爭情勢緊迫，日本當局改成徵調台灣人充當日本兵，上戰爭前線透過流血成爲日本人。從日本當局前後不一的說法看來，其實改不改姓名，都不能改變是台灣人的事實，當然也不可能成爲真正的日本人。

異民族統治台灣，台灣人民被矮化成爲次級國民，種種的壓迫、剝削讓台灣人受苦，痛不欲生，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同樣漢民族的清朝統治台灣，台灣還是不能免於語言的隔閡，官僚制度的迫害。是不是「異民族」與否？台灣人所受的對待根本沒有什麼改變。因爲只要有「統治」的事實發生，被統治的者，永遠是被剝削的一群。

「改姓名」、「異民族」與否？都只是語言遊戲，在語言上面打轉，意義不大。重點是，無論與否，都改變不了事實，扭曲不了事物的本質。

而台灣社會公認的男尊女卑的標準也是一樣。被鄙視的女人，往往是支撐家庭、興旺家運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被社會奉爲尊榮的男人，常常是依附意志力堅強的女人的庇蔭，才能功成名就或生存下去。社會的男尊女卑表象與女人不可或缺的本質，落差甚大。

事物的本質，不是言語的遊戲，也不是社會的表象。破除迷思、自在觀，才是接近事物本質的不二法門。此乃是透過《滾地郎》的閱讀，得到的啓示。

5.3 一視同仁、眾生相、自在觀的圓融筆法

摺疊鏡式、左右並陳，不妄加評斷，公論自在讀者心中的描寫，可說是一視同仁的客觀描寫方式。

事物的本質，不是言語的遊戲，也不是社會的表象。而力求參透事物本質，更需破除迷思、觀自在。

此般日據時代的眾生相、自在觀的圓融筆法，堪稱伴隨張文環精神成長後，寫作上精益求精，往前邁向更高境界。也許如果沒有經過 31 年的沉澱，是不可能培養出對事物的細膩觀察、客觀暢述日據時代的殖民記憶。是不可能涵養出平常心、圓融氣度，面對世間的種種。

5.4 借景喻情

另一獨到之處乃藉由台灣常見的動物或習性，來影射人物或隱喻人物內在的心情。久旺洞房花燭夜時的描述，藉由「貓兒」的偷窺〈第一章之四〉，來隱喻即將發生的男女肉體關係。而久旺趁吳錦回娘家過夜之際，手染幫傭女孩時，吳錦

用又犯了「貓兒偷腥」的毛病〈第二章之五〉，來數落久旺。「貓兒偷腥」的習性，與喜愛女色、風流的久旺的習性相當。而每當在心不甘情不願之下被仁德強迫發生肉體關係後，秀英的哀嘆的畫面中，總會點綴出「蛙鳴」。或秀英出現的場景，總會跟隨著「蛙鳴」。「蛙鳴」詮譯了秀英哀悽、無奈的心弦之音[31]。當然「青蛙」是秀英近距離的夥伴，當作秀英的隱喻，理應不爲過。而上述的「杜鵑鳥」，啓敏把牠看作同自己一樣孤獨尋找伴侶的縮影。啓敏苦等秀英卻不來，回想起與秀英溫存，心情盪到谷底無法排遣苦悶時，「梟與青蛙的合唱，今天聽來格外像似地獄演奏的管旋樂曲」〈第五章之五〉。此時的「梟與青蛙的合唱」，不折不扣是隱喻著啓敏與秀英溫存的喜悅。只是苦等的秀英沒來，聽在啓敏的耳朵，才會痛苦不堪。如果「青蛙」影射秀英的話，那「梟」就等於是影射啓敏。

借動物影射作品人物的心情或習性的手法，顯示張文環朝向由外界事物而至投射人物，再由投射人物進入投射人物深層心理的走向。此借物喻情的深入描繪，可看作繼《閹雞》〈1942〉之後，張文環描繪上大幅度的成長。

綜合上述分析，不難看出作者張文環使用描寫手法，是不偏袒作品中任何每一位人物。對事物的說法、看法，左右並陳處理，至於價值判斷，留待讀者公斷。易言之，整個作品的描寫，達到了一視同仁、眾生相、自在觀的最高極致的意境。此應可以與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晚年所推崇的「則天去私」[32]的境界，相媲美。

6.結論

《滾地郎》的作品時間，自 1909 年至 1945 年止 35 年間。約佔整個日據時代的三分之二左右時期。又因作品主角啓敏與作者張文環出生年代、出生地的地緣關係，非常吻合。並且考量了睽隔 31 年後開始的《滾地郎》創作動機，與 1972 年台日斷交有密切的關聯。故將《滾地郎》定位爲一部張文環的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以此爲基調，探究了張文環個人的精神、寫作風格的成長。

首先張文環觀察到，日本統治台灣的重要政策之一的改姓名，牽涉到的語言隔閡的問題，又因語言隔閡的問題，引發了「異民族」一詞的爭議。改姓名無益於台灣人成爲真正的日本人，那只是個政治語言的遊戲罷了。因爲戰爭後期日本

[31]此與被譽為「從無聲而至有聲，再回歸無聲」的最高意境描寫的日本有名的芭蕉俳句「青蛙撲通一聲跳到水裏」作品，情境雖相差甚遠，各有其特色。

[32]捨棄我執，順從自然的客觀描寫手法。

當局徵調台灣人充當日本兵，上前線爲日本國犧牲性命時，要求的不是「改姓名」，而是「流血」才能成爲真正的日本人。而「異民族」一詞，亦是個語言遊戲。對於被統治的台灣人而言，不管統治者是大和民族的日本或是漢民族的清朝，台灣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一樣的。

有關觀察台灣社會內部的現象。依賴知識，期盼日本統治期力爭上流的知識份子，卻因日本戰爭失利，而美夢破滅。相對於知識份子的潰敗，台灣的農民，依賴土地，往下紮根、認真耕耘，求得溫飽，困苦中延續了生命。農民勤奮可貴的精神，證明是殖民困境中，突圍求生之道。

而台灣社會也同傳統的中國社會、日本社會一樣，是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社會。張文環對台灣社會的深入觀察之後，透過《滾地郎》筆觸，傳達出社會的表象與事實不符。在台灣被鄙視的女人，往往是支撐家庭、興旺家運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被奉爲尊榮的男人，常常是依附意志力堅強的女人的庇蔭，才能功成名就。

上述的張文環犀利的觀察所得，都透過摺疊鏡式、左右並陳、一視同仁、自在觀的客觀描寫方式傳達出。此反應出沉澱 31 年後，張文環寫作方面的大幅成長。如果沉澱 31 年當中，張文環沒有涵養出平常心、圓融氣度，恐怕難以用純熟、無私客觀的筆法，表達出對事物的細膩觀察、客觀暢述日據時代的殖民記憶。而力求事物本質的意念，亦是沉澱 31 年後的一大斬獲。日據時代中的眾生相、自在觀的境界，堪稱是張文環前所未有的極致。實與張文環曾經接受過影響的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所追求的「則天去私」的境界，不謀而合。

本論文於 2009 年 4 月 15 日到稿，2009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審查。

airiti

引用範本

日文版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鴻儒堂，1975

引用書目

鍾肇政〈後記〉《台湾人三部曲》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

李喬《寒夜三部曲』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

川崎庸之代表監修《閱讀年表式的日本史》，自由國民社，1993・初版 1991

張建隆〈生息於斯的「滚地郎」—張文環〉張恆豪編《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 10》前衛出版社，1994・初 1991

林藜《瀛洲斬鯨録—台湾同胞武装抗日的歷史故事—》稲田出版有限公司，1992

李昂《自傳の小説》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趙世男、洪明燦《台湾老兵三国誌》前衛出版社，2000

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全 8 卷）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張文環〈山茶花—後天開始連載・作者的話〉，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台灣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2》綠蔭書房 2002

柳書琴著中島利郎譯，〈張文環『山茶花』解説——部落から都会へ、進退窮まった植民地の青年たち〉，中島利郎、川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2 台湾長篇小説集二》緑蔭書房，2002

閻延文《台湾風雲》(上下二冊)橘子出版有限公司，2003

陳玉慧《海神家族》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4

姚嘉文《霧社人止関》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

邱家洪《台湾大風雲第三冊二二八驚魂》前衛出版社，2006

閻延文《青史青山》問津堂書局，2006

津島祐子《あまりに野蛮な》雜誌《群像》，2006.9-2008.5

邱家洪《台湾大風雲》(全五冊) 前衛出版社，2006

葉石濤〈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葉石濤全集 14》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

葉石濤〈張文環文學的特質〉《葉石濤全集 14》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